

呓语还是预言

——读《中国音乐学：一个悲观主义者的呓语》解析

银卓玛^①

摘要：从上世纪末至 21 世纪之交，中国音乐学界进行了一次关于学科发展的回顾与展望。由此，2001 年《黄钟》第 1 期发表了数篇相关文章，由多位学术前沿的音乐学者撰稿。此次专题文稿围绕新世纪中国音乐学的发展而展开讨论，学者们提出了中肯而客观的寄语。这次组稿，对于中国音乐学在 21 世纪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在文稿中，有些展望与今契合，有些预言有所偏差。其中，田青对于音乐学的展望最为“悲观”，在经历 17 年后的 2018 年，“悲观”是否被证实，笔者将一一作出阐述。

关键词：田青；中国音乐学：一个悲观主义者的呓语；展望

中图分类号：J60 **文献标识码：**A DOI: 10.19706/j.cnki.cn42-1062/j.2018.04.000

1999 年，《黄钟》邀请国内数位居于学术前沿的音乐家，进行关于“展望新世纪中国音乐学前景”的专题约稿。田青受邀其中，并撰写《中国音乐学：一个悲观主义者的呓语》一文。如田先生所言：“此为本人‘正经的游戏之作’。现在看，一半如我所言，如，学习此科目者多为女性，学术论文多为评职称而用。但最大的错误，是对平面媒体过于悲观了。”^②若从 1999 年约稿算起，已经历 19 年的光景。是呓语？还是预言？当再次阅览此文，并与当下音乐学的学术环境和发展现状做一比较，会更有意义！

一、回顾同期诸位学者的相关论文

再次回顾，2001 年，《黄钟》刊登此专题的同期论文。学者们对于即将步入新纪元的中国音乐学如何顺应时代？如何发展等问题？做出了相应的回应。从中，可以发现每一位学者的观念、理念、关注点、思考点及侧重点都有所不同。

通过研读，可把同期学者的论文分为几大类：第一类，高瞻远瞩型。就 21 世纪之交，对中国音乐学如何适应国际化趋势的发展问题，各抒己见类型的文章；第二类，学科反思型。

^① 作者简介：银卓玛，女，藏族，艺术学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 100029）。

^② 田青于 2017 年 6 月 13 日，口述于中国艺术研究院。

针对 21 世纪中国高校音乐教育中可能存在的不足和失误而提出建议类型的文章；第三类，专业方向型。研究方向不同的学者对于不同专业的发展，进一步细化阐述类型的文章；^③第四类，个案研究类型的文章。^④昔今对比，这些文中的某些展望与今契合，某些并不相符。陈其大略，举其要义，可从两个方面进行阐述。

其一，与今契合的观点，又可分为几类：一是关于与国际化、多元化、港澳台学术接轨等问题，提出加强国际交流类的文章。如蔡宗德《中国音乐研究在新世纪的定位》^⑤一文、杨沐《扩展视野，更新知识，跟上时代》^⑥一文及宫宏宇《别求新声于异邦》^⑦一文等；二是关于“生态”问题，对于自然和文化两种生态恶化表示担忧，提出修外必先修内类的文章。如蔡际洲《可持续发展：中国音乐学的新课题》^⑧一文、杨燕迪教授的《展望理想的“音乐学生态”》^⑨一文及罗艺峰《现代性条件下的中国音乐学》^⑩一文等；三是具有批判精神，关于追求学术创新、开拓思路、拓展学术视野及教学体系等问题，提出推动“可持续发展”类的文章。如管建华《美国的多元文化音乐教育与中国音乐教育的思考》^⑪一文、陈铭道《新千年应〈黄钟〉杂志约》^⑫一文、郑苏《学科·学术·学生——三“学”之纲与 21 世纪的中国音乐学》^⑬一文及李诗源《走出封闭的 21 世纪的中国音乐学》^⑭一文等；四是关于发展必先固本，提出注重本国音乐文化资源的挖掘及研究类的文章。如樊祖荫《多元文化与 21 世纪的音乐教育改革》^⑮一文、乔建中《站在世纪之“界”的“后顾”与“前瞻”》^⑯一文、修

^③ 这类文章涉及中国传统音乐研究、民族音乐学、音乐心理学、音乐考古学、音乐美学及音乐社会学。如周耘：《从“汉学”到“国学”——东瀛“学问”发展轨迹之启迪》、周海宏：《音乐心理学：走向实证的音乐学研究》、罗小平：《从转型走向整合——中国音乐心理学在新世纪的发展趋势》、王晓盾：《关于音乐考古学和音乐文化地理研究的结合》、刘承华：《走向阐释学的音乐美学》、宋祥瑞：《中国音乐美学研究与海德格尔的美学诘难》及曾遂今：《新世纪的音乐社会学》等。

^④ 这类文章如冯光钰：《曲艺音乐的传播》（上、下）、蒲亨建：《“同均三宫”再辨析》、李幼平：《宋代新乐与编钟》、彭志敏：《扎扎实实地从谱本研究做起》及徐孟东：《现代帕萨卡里亚对位与和声形态》（一、二）等。

^⑤ 蔡宗德：《中国音乐研究在新世纪的定位》，《黄钟》2001 年第 1 期，第 1-2 页。

^⑥ 杨沐：《扩展视野，更新知识，跟上时代》，《黄钟》2001 年第 1 期，第 1-2 页。

^⑦ 宫宏宇：《别求新声于异邦》，《黄钟》2001 年第 1 期，第 1-2 页。作者为新西兰国立 UNITEC 理工学院艺术与社会科学院高级讲师。

^⑧ 蔡际洲：《可持续发展：中国音乐学的新课题》，《黄钟》2001 年第 1 期，第 1-2 页。

^⑨ 杨燕迪：《展望理想的“音乐学生态”》，《黄钟》2001 年第 1 期，第 1-2 页。

^⑩ 罗艺峰：《现代性条件下的中国音乐学》，《黄钟》2001 年第 1 期，第 1 页。

^⑪ 管建华：《美国的多元文化音乐教育与中国音乐教育的思考》，《黄钟》2001 年第 1 期，第 1-2 页。

^⑫ 陈铭道：《新千年应〈黄钟〉杂志约》，《黄钟》2001 年第 1 期，第 1-2 页。

^⑬ 郑苏：《学科·学术·学生——三“学”之纲与 21 世纪的中国音乐学》，《黄钟》2001 年第 1 期，第 1-2 页。

^⑭ 李诗源：《走出封闭的 21 世纪的中国音乐学》，《黄钟》2001 年第 1 期，第 1-2 页。

^⑮ 樊祖荫：《多元文化与 21 世纪的音乐教育改革》，《黄钟》2001 年第 1 期，第 1-2 页。

^⑯ 乔建中：《站在世纪之“界”的“后顾”与“前瞻”》，《黄钟》2001 年第 1 期，第 1-2 页。

海林《温故而知新——谈音乐学的学术工作》^⑦一文及赵琴《音乐·美育·新世纪远景》^⑧一文等。

其二，与今不符的学术观点。如对于现代化、科技化的过忧，或是对 21 世纪有所展望，但未给予准确推测的文章。如蔡际洲在其《可持续发展：中国音乐学的新课题》一文提到：

展望 21 世纪，我们的理论推测是：作为后工业文明（或曰生态文明）时期的中国音乐，自然应是对工业文明时期的否定和对农业文明时期的否定之否定——而在更高层次上回归农业文明时期的某些特点。^⑨

如蔡教授所言，当下各界都在提倡生态文明。虽然，中国音乐学界都在极力的挖掘、整理、研究各地方、各民族音乐。并大力提倡保护音乐文化的土壤，希望尽量保存原生态。这恐怕只是文化人或音乐人的美好愿望。何出此言？在中国，有些处于基层的政府部门，由于思想上的偏执，扭曲中央政府的初衷。做出了一些比文革时期还要过激的政策改革，可谓是中国文化乃至音乐文化的第二次连根拔起。2016 年，某些处于基层的政府部门以殡葬政策改革为名义，下文取消中华文明中延续三千多年的丧葬礼仪。并取消丧礼筵席、取消吹鼓手等。而且，这种现象南、北方均有。例如，2016 年，沙县人民政府在网上发出关于丧葬的通告“严禁吹吹打打”^⑩。再到 2018 年，这种改革已经愈演愈烈。福建省尤溪县人民政府对于规范城区丧葬活动管理的通告中，要求各乡镇人民政府：“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在城区范围内严禁送葬游街、吹拉弹唱、播放哀乐、焚烧纸钱、沿街抛撒冥币、燃放鞭炮和鸣放电子炮。”^⑪这就是对已经岌岌可危的乡村传统文化及音乐生态的重大打击，不仅剥夺了中华民族丧礼中悼念亲人的权力，更是对延续几千年的儒家人生礼仪的重创。如此，再过数年，中国何来丧葬仪式音乐的挖掘和研究？而且会牵连一些连带的音乐文化。

再如郑苏《学科·学术·学生——三“学”之纲与 21 世纪的中国音乐学》一文：“希望本世纪中国音乐学学科将培养 2000 位博士，百年后本世纪末时全国将拥有 50 个音乐学专业（研究生）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又有如此浩瀚的音乐文化，这两个数字应不会是太高吧？”^⑫至 2018 年，全国在原九大音乐学院基础上，新增浙江音乐学院。且各综合大学新增音乐学院、音乐系近百所。其中，设置音乐学系的除十大音乐学院及各大艺术学院外，部分综合大学也

^⑦ 修海林：《温故而知新——谈音乐学的学术工作》，《黄钟》2001 年第 1 期，第 1-2 页。

^⑧ 赵琴：《音乐·美育·新世纪远景》，《黄钟》2001 年第 1 期，第 1-2 页。

^⑨ 蔡际洲：《可持续发展：中国音乐学的新课题》，《黄钟》2001 年第 1 期，第 2 页。

^⑩ 参见：http://www.fjxx.gov.cn/zfxxgkzl/zfxxgkml/cxjshgldzdsx/201612/t20161201_574913.htm

^⑪ 参见：https://k.sina.cn/article_3966988353_ec73704102000aiht.html

^⑫ 郑苏：《学科·学术·学生——三“学”之纲与 21 世纪的中国音乐学》，《黄钟》2001 年第 1 期，第 2 页。

陆续设立音乐系。虽有部分综合大学艺术学院或音乐院、系还未设置音乐学系，但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早已涉及音乐学专业方向或研究领域。现如今，全国的音乐学博士毕业生早已远远超过 2000 这个数字。

此外，田青《中国音乐学：一个悲观主义者的呓语》一文中，有提到对于 21 世纪数字信息化的堪忧。后文将详述此观点。

综上，回顾 19 年前的中国音乐学术圈。学者们对于 21 世纪音乐学的发展问题，依不同方向而分别进行了阐述。其内容主要涉及中国传统音乐学、民族音乐学、音乐心理学、音乐考古学、音乐美学及音乐社会学等等。有些学者们虽有高瞻，但缺远瞩。何出此言？多数学者对于进入 21 世纪的中国音乐学并未做出较为精准的推测。但是，在诸多文章中，田青结合当时的发展事态，看到音乐学中隐存的一些问题，并以“悲观主义者”自居，撰写了《中国音乐学：一个悲观主义者的呓语》一文。下面，具体回顾一下原文，并与当代中国音乐学的发展做一比较。

二、《呓语》原文与现实的对照

概览《中国音乐学：一个悲观主义者的呓语》全文，就中国音乐学如何在 21 世纪发展？作者对于自 1999 年之后的几十年做了几个时间段的划分。以时间为界限，分为在今后的 3 至 5 年内、10 至 15 年之后、20 年之后、30 年之后及 40 年之后等不同的五个时间段。从而展开反思及展望。

笔者以当下为准，将田青文中的几个时间段进行整合，并与现今发展做比较。评述“呓语”与之契合及过于“悲观”的几处观点。

（一）与当下比较，评述“呓语”与之契合的观点一二

其一，田青以物质主义的泛滥为大背景，从而影响到人们的价值取向及趋利心理的变化，而预见到学术节操的沦落，及其地位的不断下降。尤其影射到在夹缝中生存的音乐学学术圈，其窘境更是甚之。^①由此，引发田青对于音乐学术无用论“官方认为”的思考。认为这种官方态度可能会引起财政拨款的缩减。那么，经济决定上层建筑。财政缩减，可能会引发音乐学术圈的缩水，尤其涉及高质量成果的锐减。就这一预见，笔者通过查阅，以 2018 年，教育部直属高校部门预算（亿元）为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国家双一流综合大学的财政预算超过百亿，其中，清华大学 233 亿，而艺术类高校均为 10 亿以下，如中央美术学院 7.61 亿、中央音乐学院 4.54 亿、中央戏剧学院 3.98 亿。与 2016 年相比，清华大学

^① 参见田青：《中国音乐学：一个悲观主义者的呓语》，《黄钟》2001 年第 1 期，第 1 页。

的预算增长率上浮 28.09%，北京大学上浮 26.35%，中央音乐学院上浮 8.65%。教育部直属的 75 所高校中，中央音乐学院的财政拨款为最低。^②通过 2016 年与 2018 年相比，国家财政支持看似有所提高，但与当下自然学科及其他学科相比，音乐院校的财政支持力度明显小于其它专业。由此，此呓语非呓语。

其二，田青提到“少数学者使中国音乐学逐步深化和‘与国际接轨’的努力根本无法暂缓其迅速边缘化的进程。”^③的问题中。就音乐学并没有逐步深化的观点，笔者比较认同。自 1999 年算起，至 2018 年来看，学术队伍不断壮大，且成果层出不穷。但如 20 世纪，像杨荫浏、缪天瑞及黄祥鹏等这样具有深厚古典文学功底，且精通史学、律学、音乐学的学术大师已近乎没有了。学科的分类及越来越细化的专业划分，使得具有通才的精深型学者也越来越少。如田青文中所预言：

不仅在音乐学界，在整个中国学术界也没有再出现像 20 世纪那样的学术大师。越来越细的专业化、技术至上思潮和功力主义所造就的人文精神的丧失、视界狭隘、品位下降和学术腐败，使中国音乐学面临真正的危机。目前，大家所熟知的所谓‘著名音乐学家’的名字，已经被历史和飞速发展的现实生活遗忘、湮没。^④

田青还提到：“80%的学术论文都是为得到学位和评职称而写作的。”^⑤如此段话所言，目前的高校及研究机构内，音乐学已经成为评职称的晋级工具。中国音乐学界不缺文章，但缺乏真正深入的好文章。似不缺学者，但缺少如杨荫浏及黄祥鹏一样的学术大家。这才是目前的学术悲哀！也为当代学术界敲响了警钟。不要被职称评比被迫“业余化”、“边缘化”，才是值得深思的问题。此外，中国音乐学国际化已不再遥远。随着海外留学、国际交流、学术访问及交换生等海外深造的多途径发展，较上世纪 90 年代，音乐学与国际接轨已有所进步。这一问题，田青“与国际接轨的努力根本无法暂缓”^⑥稍有出入。

其三，就中国音乐学在高校的发展情况而言，田青提出了两个层面的设想。

第一层是关于学科阵营的转移问题。田先生认为：

北京大学等一流综合大学将陆续成立艺术系并设立音乐学专业，（其学生中的 99%将是

^② 数据来源：中国青年报，2018 年 4 月 28 日。

^③ 田青：《中国音乐学：一个悲观主义者的呓语》，第 1 页。

^④ 田青：《中国音乐学：一个悲观主义者的呓语》，第 2 页。

^⑤ 田青：《中国音乐学：一个悲观主义者的呓语》，第 1 页。

^⑥ 田青：《中国音乐学：一个悲观主义者的呓语》，第 1 页。

女性)。与此同时,目前全国 9 所音乐学院的音乐学系或在进一步技术化的过程中被取消,或改称“音乐传媒”专业或“音乐与音响编辑”专业(男女生比例大致平衡)。音乐学的基本阵地将完成从音乐院校到综合大学的转移。

正如田青所预见一般,全国各综合大学均陆续开设音乐学院或音乐系,且多数已开设音乐学专业。近年来,各大学院,尤其以中央音乐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等全国音乐学院及研究机构为例,学生中至少 90%以上均为女性。如笔者在中央音乐学院攻读博士期间为例,2009 级,就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及传统音乐两个方向中,共有 8 位音乐学博士生,其中,男生只有一位。可见,学生中 90%以上是女生的预言是太准了。另外,关于田青先生“音乐学的基本阵地将完成从音乐院校到综合大学的转移”^⑨的观点。笔者以为,若综合大学取代音乐院校音乐学的教育、培养及研究工作,现在至未来的很多年可能还不行,毕竟术有专攻。综合大学内的音乐学专业还不完全具备高水平的学科发展基础,还需要大批具有专业音乐教育背景的学者及毕业生补充到综合大学内,进行较为专业的音乐学教育和研究工作。当综合大学内音乐学专业的教学及科研水平逐渐与各大音乐学院的音乐学专业齐名或领先后,阵营的转移还是有可能发生。在当下,音乐学专业并非那么可悲。但在十大音乐学院中,音乐学所受的关注度远不及其他专业,如演奏、演唱、作曲及指挥专业等。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第二层是关于在综合大学内部,音乐学不同方向的发展状况而言。田青从 1999 年至未来的 10 至 15 年之后为界,认为:

在综合性大学里,‘音乐学’中的大部分专业将从艺术系转到哲学系和民族民俗系。音乐史则转到历史系,律学转到数学系,宗教音乐转到宗教系,有关音乐技术的研究将回归到音乐院校的作曲系。^⑩

如先生所言,关于学术分科,“音乐学”的学术边界会越来越不清晰,学科跨界及学科融合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越来越多的音乐学学者、学生们已经开始与哲学、民俗学、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乃至传媒等,多领域学科进行碰撞和融合,从而加速了学术的交叉。目前而言,综合大学内的跨学科交叉教育,还不能完全取代音乐学方向的培养工作。这源于音乐学是一门需要有一定的音乐专业技术训练的学科。尤其是本科阶段正是打好专业基础的关键,就本科阶段而言,音乐学各专业在综合大学内实施交叉教育的可能性

^⑨ 田青:《中国音乐学:一个悲观主义者的呓语》,第 1 页。

^⑩ 田青:《中国音乐学:一个悲观主义者的呓语》,第 1 页。

^⑪ 田青:《中国音乐学:一个悲观主义者的呓语》,第 1 页。

不大,且在短时期不可能实现。但在研究生及以上阶段中,综合大学内部进行跨学科的交叉学习及交流已经成为现实。

其四,中国是一个包含多种宗教的国家,根据国情,宗教有着特殊的地位。田青就宗教艺术的发展问题,提出:“出于对邪教斗争的需要,政府将扶持文明宗教并有限度地发展宗教文化。中国第一所民办的宗教音乐研究机构将在北京成立,宗教音乐学将成为显学”^⑤的推测。如此预言,中国进入新世纪以来,上至国家、下至地方各级文化部门,对于宗教音乐的研究都给予了重视。近年来,各个高校及研究机构都陆续开设了宗教音乐研究中心或研究方向。并且有个别单位已经成立了类似民办性质的研究中心,例如,中国艺术研究院现已成立“宗教艺术中心”。此中心不占具体名额,并非有级别的正式单位。此外,文化部“中国化管理学会”、民政部、国家宗教事务管理局等有关部门,经政府批准成立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社会团体“中华国际宗教文化艺术研究院”。地方也已出现民办的“宗教艺术研究会”,例如,河南省“南阳市宗教文化艺术研究会”。如上,几处宗教艺术研究机构的成立,无疑是宗教音乐特殊性的体现,从而,呈现其存在的重要意义。

其五,关于互联网、数字化担忧之预见。田青谈到:“目前出版的大部分音乐学术刊物将陆续停刊,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私人网站, www.com 或 net 将逐渐取代纸质印刷品。”^⑥就目前来看,音乐学逐渐导入数字化模式,并逐渐取代纸质文本的刊阅及交流,已经成为现实。上世纪90年代末,“1999年7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中国Internet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1999年6月30日,我国上网用户达到400万,上网计算机有146万台。”^⑦2000年达到2200万台,至2008年拥有量达到1.1415亿台,以1998年为例,城乡居民家庭电脑普及率约为每千人0.9台。进入21世纪以后,城乡家庭电脑量以达到总量的41.5%。^⑧期间,2008年,中国基本实现了“乡乡能上网”,全国98%的乡镇能上网。至2018年,中国网络的发展速度,让世界叹为观止,中国已经进入了互联网时代。在人人手拿智能手机的时代,腾讯将QQ阵地转移至微信后。各类学术平台、学报、学刊及教授、学者们均一一建立公众号,将国内外最前沿的学术科研成果转化为电子版本,相互传阅学术文章、学术评论及学术思考,这已经成为日常。音乐学术圈亦是如此,先后成立了几个比较大的音乐微信群,例如“文化与音乐论坛”、“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会员群”、“中国音乐学术论坛”等等。使天各一方的各类圈内专家、学者及学生们之间建立联系,从而,进行各类学术交流、学术研讨、学术讨论等。由此,电子互联网时代对于发展中国音乐学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⑤ 田青:《中国音乐学:一个悲观主义者的呓语》,第1页。

^⑥ 田青:《中国音乐学:一个悲观主义者的呓语》,第1页。

^⑦ 陶少华:《中国国际互联网发展综述》,《软件世界》2000年第4期,第2页。

^⑧ 周宏仁:《新中国信息化成就综述》,《电子政务》2009年第10期,第2、3、4页。

已经成为身处各国、各地、不同高校、研究机构等，各音乐人之间构架的桥梁，进而促进相互的交流和学习。由此，田青对音乐学逐渐会导入数字化模式已经言中一二。互联网成就了文化资源的共享平台，尤以电子书的共享为最。使众多的史籍、书籍及文献等纸质文本不断电子化，对于电子资料的检索、搜集及整理能力不断提高和普及，人人拥有云盘和多 T 的硬盘已不足为奇，这一切均是智能及数字化等电子信息的发展，也是互联网时代的产物。人们对于厚重且不易携带的纸质文本的购买欲逐步下降。所以，田青对于音乐学数字化模式的到来具有一定的预知。关于纸质文本会不会彻底衰败这一问题，值得关注。目前，纸质资料并没有完全衰败，但比起上世纪九十年代，已经明显缩水。正如田青所呓语的一样，如果取消职称评审，可能连文中提到的 80% 的学术论文都没有了。虽然，纸质媒体并非如田青所言，没有立刻消失，但纸质媒体的电子化是社会发展的趋势。

其六，关于中国音乐学研究机构和人员的重组问题。文章这样写到：

在 1999 年后的 3 至 5 年内，中国音乐学的研究机构和人员将面临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重组，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将解体，绝大部分非研究人员下岗，极少数研究人员被教学单位收编。该所的有形资产一部分被其衍生体“中国音乐博物馆”所继承，一部分私有化，转移到数个以新技术和社会服务为招牌的小型民营机构中。^⑤

至目前而言，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虽未解体，正如田青所言，和缪天瑞、杨荫浏、黄祥鹏时期相比，相差甚远。此外，自 2002 年，音乐研究所从左家庄新源里（1972-2002）搬至惠新北里甲 1 号（2002 年至今）而言，音乐研究所从之前的四层办公大楼变为今日的三间办公室，再无“新源里”时期的科研成果展览厅、乐器陈列室、聂耳纪念室、冼星海纪念室、古琴陈列馆及音研所所属的阅览室和书库等。所有的乐器、古谱、乐集也都再无独立的陈列室、纪念馆及阅览室。音乐研究所里经几代学人搜集起来的乐器、乐谱、乐书等，也都移交至院里。所以说，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虽没有解体，但已不如之前那般辉煌。学术硬件与软件都早已缩水。其发展，虽然不及田青所言之悲观，但也不容乐观。

（二）与当下发展比较，例举“呓语”过于“悲观”之一二

田青在文中所预言的一些问题，与当下比较，有些呓语可能过于悲观。例如，自 1999 年后的 10 至 15 年之后：“大多数以“中国音乐学”为职业的研究人员已完成业内转轨或已完全改行。”^⑥目前，中国音乐学研究人员数量还较为稳定，业内转轨或改行的状况还不

^⑤ 田青：《中国音乐学：一个悲观主义者的呓语》，第 1 页。

^⑥ 田青：《中国音乐学：一个悲观主义者的呓语》，第 1 页。

多见。其次，关于 1999 年后的 20 年，正是 2019 年。田先生这样预言：

在 20 年之后：应该是中国音乐学最后一次辉煌的机会。而中国统一对世界格局造成的强烈震撼，也将使一部分国际资金和国际文化组织加强对中国文化的投资和与中国音乐学界的合作。此时，一部分已经改行或“下海”的界内人士将重操旧业。^⑧

随着各国间交流的日益密切，并依托国家“一带一路”等政策的出台，国际间的合作也日益频繁，中国音乐学的发展迎来了新的机遇。2019 年，是否为中国音乐学的最后一次辉煌，还不得而知。可是，就目前来看，音乐学的人员队伍还较为稳定。笔者认为，近十年内，音乐学界改行或“下海”的现象还可能较为少有。再次，关于田先生提到“音乐学边缘化”的预测：

在 30 年之后，意识形态对中国音乐学的影响将接近于零，但中国音乐学边缘化的进程不但没有因此停止，反而进一步加速，最终成为少数人的业余爱好。这些人对音乐的热爱和对学术的虔诚，是使“业余化”的中国音乐学仍然存在的唯一原因。全世界将只有一个巨大的音乐网站，它囊括了自有人类以来有关音乐（当然也包括“中国音乐学”）的全部信息。该网站设在中国西部最大的城市阿拉木罕，由分散在世界各地的一群年轻的“爱乐人”用业余时间义务经营。^⑨

1999 年之后的 30 年，是 2029 年。音乐学边缘化问题自上世纪末一直存在。于 2018 的 11 年后，会不会发展成“业余化”，还是一个未知数。

在当今，我们所看到的中国是一个娱乐至上，精神信仰沦丧，知识分子被边缘化的时代。如以上几点呓语，虽然未有发生。但是，并不代表永远不会发生！也许在经历了数年或数十年之后，或有发生的可能。以当下而言，过于“悲观”的呓语，恐怕还需要时间的考验和历史的见证，方可见分晓。为之悲观，也并非无稽之谈。

最后，至 2039 年。正是离 1999 年，整整 40 年之后。田青文中描述到：

一个来自津巴布韦的历史系留学生将找到这期《黄钟》的文本，为他用中文写作的博士论文《中国音乐学的辉煌与衰落》增加一条注释。他这一章的标题是：“本世纪初中国音乐

^⑧ 田青：《中国音乐学：一个悲观主义者的呓语》，第 2 页。

^⑨ 田青：《中国音乐学：一个悲观主义者的呓语》，第 2 页。

学家对中国音乐学的展望”^⑩

如此，这段话所述，田青笔锋犀利中带有诙谐，这就是一个学术大家对于中国音乐学发展的担忧。正因为关注和热爱，才会过虑。

结 语

如文章所述，近 20 年前，田青已经对当下音乐学的发展给予了理性的思考。而且，精准、到位。这不是一时兴起，而是研究过程中的不断总结和时刻反思，是对过往的回顾、对现实的考量、更是对未来的展望。

田青是影响中国音乐发展的音乐家、学者、文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面对问题时，信念坚定、亦不盲从、也不随波逐流，思想上既不守旧、又能够与时俱进。在中国音乐学发展过程中，看到问题所在，且见解独到。是成年累月之因、更是日积月累之果。在中国音乐现当代的发展过程中，具有大局观。能够设身处地的为中国音乐忧虑，并为中国音乐“操持”的人也越来越少。很多学者可以在个人的学术领域或学术范围卓有成就，但不会达到纵观全局的高度。这就是大家与学者的区别。

预言的准确不是靠‘天才’，而是‘高瞻远瞩’，站的高，从社会发展的大方向分析，这也是大多数音乐学人所缺乏的大视野、大胸怀！笔者认为“一个悲观主义的呓语”并非呓语，此呓语非彼呓语，呓语呓语也。田青此文，发人深信，尤其是对青年音乐学学习者们的思考有着深远的影响。笔者非常欣赏田青老师的一句话：“学者应该具有悲观主义情怀”。我认为悲观主义情怀正是鞭策自我优化和不断完善的警示。

^⑩ 田青：《中国音乐学：一个悲观主义者的呓语》，第 2 页。